

孙中山与黄兴关系研究综述

萧 致 治

以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为起点,中经辛亥革命、护国战争,到1917年粉碎张勋复辟的十二年,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三次大飞跃的第一次大飞跃时期,也即是经过帝制和反帝制的激烈斗争,最后结束两千多年来中国君主专制统治的年代。孙中山和黄兴的结合,促成同盟会的建立,是掀起这场斗争高潮的起点;他们同心协力,领导革命力量开展各种形式斗争,是夺得这次斗争胜利的关键。从全局来说,这场斗争是孙黄领导和组织的,孙黄关系也就成为事关这场斗争成败的重要问题。

关于孙黄关系,以往专门研究的文章虽然不多,可是在研究辛亥革命和孙中山、黄兴的论著中,无不或多或少有所涉及。本文拟对过去孙黄关系的有关论述作一综合的评论。

谁是孙黄结识的介绍人

孙中山和黄兴第一次会见,直接导致同盟会的成立,因而这是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见。这次会见,谁是介绍人?近三十年的著作中,基本上有两种说法:一种意见认为介绍人是君主立宪派杨度,左舜生的《黄兴评传》、邵传烈的《孙中山》,以及何汉文等的《杨度传》均持此说;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日本友人宫崎寅藏(即白浪滔天),采用此说的有薛君度的《黄兴与中国革命》、台北国民党党史会编的《国父年谱》、史扶邻的《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》、李云汉的《黄克强先生年谱》、尚明轩的《孙中山传》、广东哲社所历史研究室等编的《孙中山年谱》、毛注青的《黄兴年谱》、章开沅等主编的《辛亥革命史》、李新主编的《中华民国史》、陈锡祺的《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》(1984年修订版)等。两种意见产生分歧的原因,主要是根据的资料不同。

前一种意见依据的是章士钊的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》和杨度对亲友的谈话;后一种意见的依据主要是宫崎寅藏的《清国革命军谈》和《宫崎滔天氏之谈》。针对上述两种意见,日本东京学艺大学中村义教授1983年3月在日本《辛亥革命研究》第三号上发表了《滔天是孙文与黄兴初次见面的仲介人吗》一文,在对上述资料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,倾向于孙黄结识的介绍人是杨度而不是滔天。1984年10月27日,《团结报》发表述直的《孙黄认识究竟是谁介绍的》一文,也认为“介绍孙黄认识的与其说是宫崎,还不如说是杨度”。1984年11月在广州召开的孙中山学术讨论会上,中村义先生又提交了《有关孙中山与黄兴初次会见的探讨》一文,再次认为孙黄“初会见的介绍人是杨度”,“杨度具有充分的介绍人的条件”。其理由是:

一、宫崎的《清国革命军谈》等是凭记忆写下的，“在年代和事实方面缺乏准确性，有些地方的叙述也含糊不清”。比如在《宫崎滔天氏之谈》中曾说宋教仁参加了会见，而宋教仁日记《我的历史》中却没有记载。此外，这两篇文章记载有出入，且不能断定是初次见面，相反“从两段文章中均可看出，有可能孙与黄已经认识了”。

二、章士钊的回忆文章，明确记载“克强与吾皆初见先生”。章与黄同是湖南人，当时在一起生活，两人互相了解，而且“章是一位文学家，又具有理论学识，是很重视事实真相的知识分子，……章的文章似乎可以被采信的”。

三、杨度是同盟会成立前二三年在东京大多数留学生的领袖。早在1903年已经和孙文有所交往。另外，杨度和黄兴也有过亲密的关系，因此，“杨度成为孙文和黄兴的介绍人之事，〔是〕具有充分的条件的”。

中村先生的分析，有些是合理的。如指出宋教仁未曾参与孙黄会见，这是正确的。但因强调了一些因素，却忽略了另一些因素，从而在总体上就缺乏说服力。如强调宫崎文章是凭记忆写下来的，缺乏准确性，却忽略了章士钊的文章同样是凭记忆写的，同样有不准确之处；强调杨度与孙黄有过交往，却忽略了宫崎与孙黄关系更加亲密。特别是注重对宫崎和章士钊的文章分析，却忽略了结合其他资料进行综合考察，更易带来片面性。揆诸时势，如果说孙黄结合，仅凭杨度一言，显然大悖情理，也不符合事实。若要如实解决这个问题，需要对当时情况进行全面分析，联系各方面资料加以考察。笔者认为主要介绍人不是杨度而是宫崎寅藏。章士钊的文章虽是亲身经历，因系多年后的回忆，难免差错；杨度的谈话只能说曾向孙中山推荐过黄兴，并不能说明是首晤。而且章杨的谈论都是在辛亥革命胜利多年以后，孙黄早已成为领导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革命领袖，难免不有自我表彰之嫌。据宋教仁日记推测，孙中山到达东京约在7月24日前后，28日孙中山与陈天华、宋教仁等会晤于《二十世纪之支那》社，29日华兴会内部开会商议联合问题时，宋说：“先是，孙逸仙已晤庆午（即黄兴）”，是则孙黄会见应在28日之前。这样，从24日至27日，前后不过四五天，章士钊说，孙与杨“聚议三日夜不歇”之翌日才和黄兴会晤，显然不实。即使如此，也只能是杨度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做个顺水人情，向孙中山推荐一句黄兴，决不是主要牵线人。而主要牵线人是宫崎寅藏，其理由：

首先，宫崎早在1897年即与孙中山订交，此后联系一直十分密切。另外，宫崎自和黄兴结识后，很快也成为至交，比起杨度和孙黄的关系显然要深得多。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，孙抵达日本横滨日期还只告诉了宫崎，而且孙到东京后的活动，不是由宫崎陪同，就是由程家桢安排或伴送；程家桢的消息又得自宫崎。所以介绍孙黄见面，宫崎最有条件。

其次，宫崎曾两次专门谈到他怎样引导孙中山和黄兴见面，虽然个别情节前后有出入，而基本内容大体一致。从这两次谈话的内容看，有几个主要情节是前前后后一贯的：一是孙见到宫崎，即迫不及待询问有无杰出人物或我党之士，足见孙为革命求才之切；二是宫崎早就准备把黄兴介绍给孙中山，并誉为“非常人物”，孙中山得悉后，立即要求宫崎陪同去见黄兴；三是参加孙黄会见的还有张继和末永节，地点是神乐坂附近的中国餐馆凤乐园。在《宫崎滔天氏之谈》中，还特意提到，“在那里，孙和黄初次会见”；四是孙黄通过两小时的畅谈，最后取得了成立联合团体的一致意见，两人举杯祝贺示庆。关于最后这点，宫崎的叙述虽未明言，宋教仁的日记却为此作了注脚。7月29日，宋教仁记道：“孙逸仙已晤庆午，欲联络湖南团体中人，庆午已应之，”证明双方通过会谈，黄兴已同意联合。所以，孙黄结合，宫崎应是直接和主要介绍人。

第三、参加这次会见的张继，也认为介绍人是宫崎而不是杨度。张说：“1904年冬，离沪赴倭，与克强同寓于牛込区神乐坂旁。1905年夏间，总理由美（按：应为欧洲）来倭，宫崎寅藏介绍克强晤面，商组革命大同盟事。”^①

第四、刘揆一是当时和黄兴最接近的人，他也认为介绍人是宫崎寅藏。刘在《黄兴传记》中说，他与黄兴于1905年5月重复东渡后，黄“由日本民党宫崎寅藏之介绍与孙公相会于东京风乐园。……协议结果，将孙公主宰之兴中会与华兴会，及留学界深表同情者，合组为同盟会。”^②

第五、冯自由是老兴中会会员，冯家是孙早年在日本活动的主要驻足地，他也认为介绍人是宫崎寅藏。冯说：1905年孙中山由欧洲到日本，“时各省同志中负人望者，以华兴会领袖黄兴（黄軫改名）为最，孙总理前尚未与之认识，至是始由日人宫崎寅藏介绍黄……与总理相见于东京风乐园。黄等对总理备致倾慕，并愿率领华兴会全体会员与总理合组新革命团体。总理深表赞同。”^③

第六、黄兴长子黄一欧曾随宫崎寅藏一起生活多年。他也认为：“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前夕，中山先生与先君初次会晤的介绍人就是宫崎寅藏”，并说：“我后来听到宫崎寅藏谈过，当年先君住在牛込区若宫町，他陪同中山先生专程走访，在坐的还有张溥泉（继）和末永节。先君邀他们一起到风乐园进餐，举杯痛饮，尽欢而散。”^④

此外，黑龙江俱乐部《国土内田良平传》第249页也讲到他们经宫崎介绍会见的情况。

总之，上述各种资料，虽然彼此之间有些出入或矛盾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，即众口一词，认为孙黄结识的介绍人是宫崎寅藏。

辛亥革命前的孙黄关系

从同盟会成立到辛亥革命爆发，是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上升时期，也是孙黄合作最亲密的年代。他们在生死与共的艰苦斗争中推诚相待，彼此信任，黄兴处处注意维护孙中山的威信，孙中山也把黄兴当成自己的左右手，双方结成了亲密的战斗友谊。关于这段时期的孙黄关系，中外学者都认为他们相处得很好。许多论著指出，孙黄的密切合作，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，对革命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。

首先，孙黄的带头联合，从而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大联合。对此，有些论著正确指出，在这一联合中，“兴中会的领导人孙中山和华兴会的领导人黄兴，在促成合组同盟会的过程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”（方志钦：《论孙中山和黄兴的关系》，《辛亥革命史丛刊》第一辑）。

其次，由于孙黄推诚合作，对同盟会的巩固和发展也起了重大作用。同盟会成立以后，从1907年开始，曾经风波迭起，几乎导致大分裂。由于在每次风波中，黄兴和孙中山从维护革命团结出发，采取较正确态度，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。1907年初，孙黄为旗式问题，双方都动了肝火。幸亏黄兴冷静下来以后，“为党为大局”，主动让步，这场争执才算平息。关于这次争端，学者们对黄兴的态度是肯定的。他们说：“黄兴毕竟是识大体、顾大局的革命者，在盛怒平息后，他不仅没有退出同盟会，反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孙中山周围，殚尽心力为同盟会的革命工作日夜操劳。”^⑤同年6月，因为日本政府赠款及款项分配问题，章太炎大肆攻击孙中山，逼迫代理庶务刘揆一召开会议，改选黄兴为总理。黄兴从维护团结出发，严正指出：“革命为党员生死问题，而非个人名位问题。孙总理德高望重，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，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，且免陷兴于不义”。黄兴这种不图个人名位、注意维护革命团结的态度，

受到学者的普遍赞扬。他们认为：“孙中山是当时中国革命民主派的一面旗帜，黄兴以其正确态度维护了孙中山的威信，也维护了同盟会的团结。”^⑥1908年后，陶成章等又掀起第二次倒孙风潮。针对陶成章的破坏和攻击，黄兴作了有理有节的斗争。黄兴这种坚决维护团结、反对分裂的正义行动，受到学者们的普遍好评。他们指出：“由于孙黄团结无间，所以陶成章的倒孙分裂企图不能得逞。在这场纷争中，黄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，如果不是黄兴坚决站在孙中山一边，同盟会很可能陷于瓦解”（《论孙中山和黄兴的关系》）。有的则认为，尽管黄兴对孙中山有意见，“但当党内一部分人闹分裂活动时，黄兴却能力持大体，维护同盟会的团结，维护孙中山的领导威信。这是值得称道的。”^⑦

第三，孙黄态度一致，促使思想战线上和改良派的斗争得以进行到底。同盟会成立后，即以《民报》为阵地，在思想阵线上展开了对改良主义的批判。经过一年多的论战，当保皇谬论受到革命派痛斥无法招架之际，改良派被迫玩弄“求和”骗局。由于孙黄态度一致，保皇派无隙可乘，这场分清大是大非的论战才得免于半途而废。

第四，由于孙黄密切合作，同盟会发动的武装斗争得以顺利开展。在组织历次武装起义中，孙中山积极在海外筹款购械，黄兴则亲临前线，冒着枪林弹雨，组织和指挥起义，将孙中山的武装起义计划付诸实施。正是由于孙黄密切配合，一次接一次的武装斗争才得顺利进行。有的论者指出：黄兴竭诚拥护和积极执行孙中山的武装起义计划，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一系列起义。这些起义虽然都归于失败，但革命武装斗争的烽火却因此在全国各地越烧越旺。“这固然是孙中山多年奔走革命的结果，同时也是黄兴身先士卒、亲临前线，将孙中山的革命方略付诸实施的功劳”（《论孙中山和黄兴的关系》）。

辛亥革命前，孙中山和黄兴所以能长期亲密合作，主要是有共同的思想基础，共同的奋斗目标，两人能顾大局、识大体。特别是处在协助地位的黄兴，不计较个人名位，尊重孙中山，注意维护孙中山的威信，这样就保证了领导核心的团结。革命的团结是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，辛亥革命前革命斗争的顺利进行，是与孙黄团结一致分不开的。在以往的研究中，对孙黄的团结合作原因缺少深入分析，孙黄团结合作的经验与意义也研究较少，这些还有待今后努力。

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

如果说，学者们对辛亥革命前的孙黄关系看法比较一致，那么，对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，观点则有较大分歧。武昌起义以后，各省纷纷独立。面对不可阻挡的革命潮流，革命派沉浸在一片胜利声中，对敌人的破坏和阴谋诡计失去警惕。他们对拥护共和的人，不论是真是假，一律至诚相待，委以重任。作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和黄兴，对新形势同样认识不清，他们对某些问题观点一致，在另一些问题上却存在分歧。由于孙黄在认识上本来有差距，加上学者们对问题的看法不一，因而在评价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上也就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分歧。

首先是武昌起义后对袁妥协问题。一种意见认为，黄兴在辛亥革命后，消极一面有了明显的发展，他的革命意志很快地衰落下去。妥协，开始成为他思想上的主要特色。在南北议和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，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焦点是政权问题，黄兴开始就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力主和袁妥协。后来孙中山曾主张继续战斗，黄兴和另一些人还是力主和袁世凯妥协。这虽然不是黄兴个人的责任，但他要负相当的责任。另一种意见认为，黄兴没有识破袁世凯以

窃夺全国政权为目的的和谈阴谋，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。但当时南北妥协是既成之势，即使孙中山对和谈及袁世凯当总统，始终没有表示过坚决反对的态度，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“随大流”，完全可以说，孙中山和黄兴在对袁世凯妥协的问题上并无根本分歧，只不过因所处的境况不同而稍有差异。

第二是“宋案”及“二次革命”问题。一种意见提出：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，他的反革命面目已完全暴露。孙中山主张武力解决，黄兴反对，主张法律解决，后来虽然被迫兴师讨袁，但很快就一走了之。他这时的态度完全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。另一种意见认为：孙黄在宋案后的对策上是有分歧，但双方各有长短。孙中山透过宋案，看到袁世凯帝制自为的企图，表明了他的洞察力确是高出于黄兴等多数人之上。但是，他对形势的看法却过于乐观，把反袁斗争看得太容易了。黄兴要以法律解决，无异与虎谋皮。但是，他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分析却是可取的。

第三是重组中华革命党问题。一种意见认为，组织路线是服从于政治路线的。黄兴随着革命意志的衰退，在组织上也走上了分裂的道路。在中华革命党成立时，黄兴拒绝参加，远走美国。尽管他没有公开攻击孙中山，但谁都可以看出，这是“孙黄”之间的分裂。另一种意见认为，黄兴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，客观上促进了革命派内部的分化瓦解，这是毋庸开脱的严重错误。但孙中山片面苛责黄兴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，“二次革命”的失败，孙中山全部透过于黄兴，“刻责无已”，这是很不公允也很不策略的做法。因此，辛亥革命以来已经出现的孙黄裂痕进一步扩大了，黄兴无法接受这一指责，一气之下，出走美国。但孙黄之间的关系并未因此完全破裂，他们继续维持着革命情谊。黄虽然不愿加入中华革命党，却并没有反对孙中山及其学说。然而孙黄关系毕竟因政见不同和有人从中挑拨离间，已经恶化到不可能共商大事的程度。

第四是讨袁护国问题。一种意见认为，孙中山领导中华革命党，组织讨袁斗争，黄兴到美国后，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反袁宣传，但始终没有回国直接从事反袁斗争。袁世凯称帝前夜，他的态度有所变化，主张“发难须急”，但终究也不能因这些而改变他这个时期妥协的基本倾向。另一种意见则说，1915年12月袁世凯公开称帝，孙中山发表《讨袁宣言》，坚决表示除此民贼；黄兴也立即致电美国驻北京公使，劝他不要赞助袁称帝，声明中国如果“立起革命”，“吾定返中国，……竭尽吾最后之气力，驱逐国贼”。1916年5月，孙中山发表《第二次讨袁宣言》，表示坚决与袁世凯斗争到底；黄兴对孙中山《第二次讨袁宣言》“无任钦佩”。黄兴回国后，孙黄“互相从过，商谈国事，一往如昔，并无丝毫芥蒂”。孙中山为了表明与黄兴合作的诚意，决定“整顿党务”，重订党纲及章程，把中华革命党改称国民党。孙黄之间多年的重大分歧，从此基本消除。

上述分歧的焦点是：辛亥革命以后，孙黄由于政见分歧是否已形成两个派别？他们之间的分歧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分歧？持前一种意见的学者认为，辛亥革命以后，孙黄之间就产生了政见分歧，宋教仁被刺后，政见分歧更加深化，已经有所谓孙派、黄派之分；“二次革命”失败以后，黄兴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，政见分歧已发展成为组织分裂，他与激进派的思想裂痕已经无从弥合；袁世凯取消帝制和病死后，黄兴由美回国，仍然鼓吹法律解决，直至临终还谆谆叮咛“国会要注意立法”。总的来说，妥协性在他们身上已占了主导地位。持后一种意见的则认为，辛亥革命后，孙黄之间尚未发生分歧，他们的分歧是在宋教仁被刺以后才开始的。宋案发生以后，由于对形势估计不同，孙黄在对策上产生分歧。二次革命失败，孙黄关系因经不起失败的考验而出现了很大的裂痕，孙中山以为自己在“二次革命”中是完全正

确的，革命的失败在于他的正确主张得不到贯彻，决心重组中华革命党。黄兴对组织革命党持反对态度，但他信守诺言，在美国从未另立组织，而以宣传反袁为己任。当中华革命党因欧事研究会干扰在国外难于筹款时，黄兴却嘱咐华侨可将筹款直接寄孙中山支配。在讨袁战争中，黄兴与欧事研究会有过不少接触，支持他们参加进步党所发动的护国战争。但也与孙中山联系密切，主张联合一致，共同讨袁。袁死后，他又复电孙中山希望主持一切。总之，黄兴不是资产阶级右派，更不是右派的领袖，对他在晚年所犯的一些错误要历史地、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。

为什么在研究上会有上述意见分歧？首先，需要从研究方法上找原因。研究历史问题，忌带片面性，必须全面占有材料，对问题进行全面分析研究，然后才能引出合乎实际的结论。上述分歧的产生有些就是由于方法上的片面性而导致的。比如对袁妥协问题，强调黄兴主张妥协，孙中山反对妥协，在材料的引用上就犯了片面性的毛病。孙中山本来在伦敦就致电民国军政府提出过，不管是黎元洪还是袁世凯，当总统都“合宜亦善”。另外，还有材料说，孙中山在伦敦时，在吴稚晖等同盟会员的怂恿下曾致电袁世凯，告知他如能“倒戈为汉灭清”，就推举他为总统（转引尚明轩《孙中山传》第169页），说明孙中山还在国外就有对袁妥协的意向。但有些学者为了说明孙反对妥协，却不引或忽视上述资料，往往只引“革命之目的不达，无和议之可言也”一条来印证自己的观点。1911年11月9日，黄兴本来是一面致函袁世凯，希望他归诚反正；一面密谕前线各地将领，揭露袁世凯派人散布邪说，离间军心，速饬密探查拿，以两手应付当时局势。而有些著作为了说明黄兴妥协，却只引前条资料，忽视后面一条。又如评论讨袁斗争时，强调黄兴“始终没有回国直接从事反袁斗争”，这又是只看到问题的一方面。其实尽管黄兴没有直接参加讨袁斗争，他的作用并不亚于直接参加。他早就和蔡锷有联系。蔡锷途经日本顺利到达云南，就是由他精心安排的。云南唐继尧怕蔡去后夺他的权，也是由黄打通关节，保证“蔡只借滇军讨袁，不为都督、不留滇，到即率兵出发”（《陈嘉会日记》1937年1月13日条），才使蔡能顺利发动护国战争。另外，李烈钧也是在黄兴的函促下由南洋抵昆明参加护国战争的。其他如致函张孝准部署讨袁策略，致函陆荣廷敦促兴师讨袁，通电全国呼吁一致讨袁，致函唐绍仪等请逼袁世凯早日退位，直至争取冯国璋等等。这些对于打倒袁世凯，分化瓦解附袁势力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因此，如全面地考察，则不应以黄兴未能直接回国参加讨袁斗争，就说他没有积极投入讨袁斗争。

研究方法上的另一个问题，就是对某些资料的解释，忽视结合具体条件，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。同一资料，单就字面孤立解释与结合具体条件分析，往往大不一样。即如上引“革命之目的不达，无和议之可言”一条，如只从字面解释，似乎是孙中山坚决反对议和的有力证明，而且和前些时从国外发回电报显然是两种态度。实际上，如结合具体条件进行分析，这两条资料不但没有矛盾，而且前后是一致的。因为孙中山回国时，正值南北和谈代表达成协议，君主民主问题要待“国民会议”“公决”，孙中山的话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谈的。当时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推翻君主政体，建设民主政体。既然君主民主还待“国民会议”“公决”，革命目的显然没有达到，在孙中山看来，自然无和议可言了。这和在国外的电报就一致起来了，因为他同意选袁或黎当总统，是以实现民主共和为前提的。离开了民主的前提，就不可能有总统的选举，这是小学生的常识。另外，关于“妥协”问题，也往往忽视结合具体条件进行具体分析。妥协有两种，一种是有原则的妥协，一种是无原则的妥协。马克思主义认为，为了长远的利益，在一定条件下实行有原则的妥协，不但是允许的，而且是必要的；而无原则的妥协，实际是叛卖行为，应该坚决否定。辛亥革命时期，对袁妥协，无论是黄兴，还是孙中

山，都是以实行民主共和为条件的。袁如不承认共和，决不会选他为总统。所以要在对袁妥协上分左右，是不符合当时实情的。至于当时为什么要实行妥协，一方面如大家已指出的，是根源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；另一方面则是当时阶级力量对比决定的。武昌起义后革命声势虽大，基础并不巩固，军民能战的不多；群众虽有饱满革命热情，革命派却没有认真去发动和组织；立宪派等在革命高潮时虽然倒向了革命，但只要形势一变，就可能改旗易帜。山东孙宝琦独立后又取消就是证明。所以当时对袁妥协，也可说是当时阶级力量对比决定的。

除了研究方法上的原因外，也有“左”的影响在起作用。“左”的影响虽然主要表现在现实斗争中，学术领域也是有反映的。由于孙中山不但在辛亥革命中立下了丰功伟绩，而且在大革命时期又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。对于孙中山光辉的一生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再给予充分肯定，这是完全正确的。但是，因为受到“左”的影响，反映在历史研究中，就逐渐形成对孙中山只强调正确的一面，而讳言他的缺点错误，甚至有意无意地为他的错误辩解。相反对于黄兴，有时为了适应某种需要，或为了说明某一观点，则不免有些苛求。另外，在一些观念上，多多少少也有“左”的反映，如革命或妥协，在人们的印象中，认为凡是“妥协”都是不好的概念。如前所述，对妥协还是应该具体分析，不宜一概否定。这类影响反映在孙黄关系的研究上，无形中产生一种“扬孙抑黄”的倾向。如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，在有些著作中就把孙中山描写成只是勉强赞同，黄兴则是积极支持者，实际并非如此。又如“宋案”和“二次革命”，也是全盘肯定孙中山，否定黄兴，实际上他们是各有是非，只能相比较而言，孙比黄要高明些。对于重建中华革命党问题，有些著作也是对孙肯定过多，对黄责备过严，有欠公平。

作为一个历史学家，在评论历史人物时，要象一个铁面无私的审判官，对一个人的功过是非，应该公正无私，符合历史本来面目。要正确评论孙黄关系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，学会全面地看问题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、看主流，尽力防止片面性和主观性，同时注意清除“左”的影响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引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。

注释：

- ① 《张溥泉先生全集》第234—235页。
- ② 《辛亥革命》资料丛刊(四)，第281页。
- ③ 《革命逸史》第二集，第148页。
- ④ 《辛亥革命杂忆》，《湖南文史资料选辑》第十辑，第36页。
- ⑤ 章开灏等主编：《辛亥革命史》第72页。
- ⑥ 杨天石等：《同盟会的分裂和光复会的重建》，《辛亥革命史论文选》上，第432页。
- ⑦ 金冲及等：《论黄兴》，《辛亥革命史论文选》下，第1195页。